



上海市理论界 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

编者按 近日,上海市理论界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研讨会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行。与会者围绕上海如何高质量、高水平服务国家战略、打响“四大品牌”、建设“五个中心”、推进超大城市党的建设等重大课题展开交流讨论。现刊发其中4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以启发更多思考,进一步深化“上海研究”。

■ 严爱云

『进城赶考』取得优异成绩

1949年2月,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毛泽东号召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上海既是中国的最大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制造业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曾经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因此,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要过的一大难关。为此,老一辈革命家殚精竭虑、运筹帷幄,指导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取得了“进城赶考”的优异成绩。

第一,制定实施“完整保全上海”战略,为上海解放后迅速恢复重建保全物质基础。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保证上海这座繁华都市不被战火所毁,同时为避免进城接管后产生社会混乱、停工停电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广泛查阅资料,听取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澜汇报,科学研究对策,精心选配上海解放后的党政班子,确定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并抽调懂经济、熟悉上海情况的各类人才加入接管队伍。

在解放和接管上海过程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和修改19份电文,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强调把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一体考虑,军事服从政治,解放服从接管,重要的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上海。

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在丹阳组织干部战前集训,开展好解放和接管上海的思想、政策、组织和物资各项准备。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下,上海的水、电、煤气、通信、交通在战火纷飞中基本正常运行,创下了奇迹。解放军进城纪律严明,赢得政治声誉。接管工作按照政务、财经、文教、军事四大系统有条不紊地展开,两个月顺利完成。

第二,积极应对执政之初的严峻考验,取得经济斗争的胜利。

上海解放后,党面临能否在经济上、政治上站稳脚跟的考验。特别是,投机势力以上海为据点兴风作浪,哄抬物价,贩卖黄金、美钞、银圆扰乱金融市场,抵制人民币进入流通领域。

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于1949年6月10日一举查封金融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取缔银圆投机活动。不久,陈云在上海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研究部署克服财经困难良策。1949年7月到1950年2月,投机者又先后三次发起以粮棉煤“两白一黑”为主的涨价风。陈云从全国各地调运物资进入上海,综合运用贸易、金融、税收等手段把投机势力彻底打垮,使资本家领受了共产党治国理财的能力,被毛泽东誉为“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1950年4月,陈毅给中央发了6份电报,汇报面临的困难和采取的措施。毛泽东先后4次复函给予极大关切和具体支持,如同意税收从每月4000亿元降至3000亿元。同时,上海根据中央精神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救济失业工人,终于度过了危机。毛泽东将上海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批转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借鉴。

第三,倡导民主建政,团结各方力量形成同舟共济政治优势。

上海历来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阵地,各民主党派核心成员及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都在上海活动过。毛泽东、周恩来一再叮嘱团结各界人士共同建设新上海,并指示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机关。

194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多次邀请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等上海民主人士座谈,听取他们对接管上海的建议。上海解放伊始,周恩来与陈云、李维汉宴请即将返沪的黄炎培等一行,并指示一律聘请他们为顾问,以动员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等。

新中国成立后,朱庆龄、张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炎培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还两度致电上海:“必须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及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参加工作”,“亦必须有一部分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接管”。

在此大背景下,陈毅登门拜访宋庆龄、张澜、颜惠庆、张元济等在沪民主人士,与各界坦诚协商管理城市的办法措施,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从而将各界人士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齐心协力战胜困难。

经过各方努力,上海迅速治好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把旧上海改造为人民政权巩固、民生生活安定、社会秩序良好、社会风气清新的新上海,进而有力地发挥了支援全国的作用。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上海靠什么长久繁荣发展

■ 张道根

经过70年社会主义建设,上海已从传统工商业城市转变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逐步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我国全局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始终按照中央要求,服从服务国家战略,不断开创新建设新局,持续迈上更高台阶,一直走在全国改革发展前列。

服务大局、抓住关键,巩固和增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独特优势

把握变化,谋划明天。上海未来靠什么长久繁荣发展?应该看到,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上海“五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期。我们要有更宽广眼界、更久远战略眼光,始终走在时代发展前列,着力构筑长期发展战略优势,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因此,不能仅靠前人奋斗成果吃老本,不能只顾眼下日子得过且过,不能绕过难题、回避矛盾给明天增加麻烦,而要咬住长远目标持续努力,再创辉煌,要着眼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规划上海拥有怎样无法被取代、难以被撼动的战略优势,要敢啃最硬的骨头,敢涉最大的险滩、敢碰最复杂的矛盾,解放思想,富于创造、勇于超越。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

的长期战略优势就是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特有的功能优势,要发挥引领创新创造、配置世界资源、推动文明进步、实现绿色发展的引擎作用,要把握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服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着力巩固和增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独特优势。

第一,核心是聚焦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科技、教育、人才总体水平高、产业能级高和产业链完善的优势,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服务能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营造创新型中小微企业集聚发展的良好环境。

第二,关键是要拓展开放这个上海最大优势。

要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国际合作与竞争,充分发挥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功能作用,用好大市场体系,用好沿海沿江港口群、机场群和便捷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用好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吸引更多全球性企业、跨国公司扎堆落户,巩固上海集聚辐射国内外资源要素的功能,提升配置全球产业链能力。

第三,根本上要加大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对标国际最好水平、最高标准,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要抓住难点,聚焦重点,深化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完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宜居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增强经济中心城市制度竞争力,巩固率先改革、引领改革的体制机制优势。

在长三角一体化中谋提升

■ 周振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面向未来、面向全球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必须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进程中。这是谋求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必由之路。

数据显示,全球最大的40个巨型城市区域,以不到18%的世界人口,却承担了66%的全球经济活动和近85%的技术和科学创新。过去,我们容易把城市和城市割裂开来,似乎城市发展与发展地区是两回事,从而把发展视野及其政策局限于城市本身。事实上,城市的价值不在于集聚与辐射,必须依赖于地区。全球城市不是“鹤立鸡群”地对外全球连接,而要通过空间扩展,进一步融入全球水平日益提高的区域发展之中,并切实发挥引领和核心作用。

例如,纽约在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区与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等城市形成完善的产业分工格局,被形容为“九大行星围绕一个太阳”。又如,伦敦在英国、欧洲乃至全球市场中显示出高度的连接功能,又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呈现了一个多功能的城市间关系。

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全能城市,全球城市也非超能城市,关键在于根据城市定位和比较优势增强核心功能与竞争力。在城市

空间有限的条件下,不能有效疏解非核心功能,势必产生空间拥挤和排斥效应。

长三角要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首要前提是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特别是,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信息、思想、人员、资本的流动,包括现代服务业日常活动引起的有形、无形流动,需要进一步实现关系集成。在此基础上,形成现代服务业网络、产业价值链网络、创新及技术服务网络、交通网络、信息网络、政府网络、非政府组织网络、社会网络等集成。

这种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集成,不是随机、无序、发散性的,而是基于相对稳定、固定的组织(网络),是持续、有序、收敛性的。过去我们讲长三角协同合作,往往强调以项目为载体,特别是周边城市承接上海外溢或溢出的具体项目。

基于组织(网络)的资源要素流动,主要载体是网络连接“水龙头”,目的是保证两边池子里的水充分流动,项目则是水池里的鱼。只有“水龙头”接口越大,两边有更多活水,池子里的鱼才能更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要着力于构建各种网络,并装上更大接口,深入推动资源要素流动。

长三角要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核心是形成地区(城市)合理分工与高度连接。这是长三角区域能否保持强大生命力和活力的关键所在。

以服务人民、造福人民为出发点

■ 冯小敏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70年来,上海从“十里洋场”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切实加强基层党建是一个重要抓手。

上海解放后,有133个党支部,党员8665人;70年后,上海党组织数量超过10万,党员人数为206万。70年来,上海基层党组织不断适应新情况、新挑战,以先进性、纯洁性和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以服务人民、造福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为要求,勇于探索创新,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回顾上海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党建历程,有这样几点体会:

第一,城市基层党建在服务发展、关注民生中彰显政治组织优势。

在70年发展的每个阶段,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始终围绕发展、关注民生,面对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民生改造更新、人口急剧增长等多重挑战,基层党建直面新矛盾、研究新情况、破解新问题,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总的来看,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始终聚焦

城市发展重点难点,不转向、不动摇,不断适应新要求,既勇于解放思想,又敢于有所作为,发挥了独特的政治组织优势。

第二,区域化党建体制机制创新为社会治理创新探索新路。

随着城市化深入推进,社会的流变性呼唤稳定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呼唤协调性,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呼唤综合性,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呼唤精细化。这些特点决定了城市基层党建必须创新体制机制。

城市基层党建实践催生区域化党建格局,区域化党组织具有稳定性、综合性、权威性优势,在不改变隶属关系、利益格局的前提下,有助于探索多重主体共治路径,搭建各方协同平台。

在上海的实践中,坚持分级管理,注重条块融合、资源整合,实现上下联动、各方统筹、区域整合、综合施策、城乡基层托底,有力地促进了党建效能最大化、最优化。可以说,区域化党建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等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

第三,资源配置和工作重心下沉是城市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全力抓好“三大任务”、用好“一个平台”,开拓放大新优势

构筑长期战略优势,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实施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有力有序推进自贸试验区扩区,做好科创板建设,抓深抓实中国国际贸易博览会,巩固提升上海既有优势,开拓放大新优势。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在服务、辐射、带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提升上海特殊的核心城市功能优势,真正实现绿色、低碳、高效发展,促进长三角成为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

——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要成为我国最高水平、最大限度对外开放新载体,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打造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制度,提升上海配置全球资源、资本、物流、服务和国际企业的功能。

——设立科创板,要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资源、创新企业直通渠道,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融合互动的吸引力、影响力、辐射力,持续提升上海募集团内外创新资源、创投基金、风险资本的能力。

——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要抓住我国市场规模巨大、消费需求升级、对外投资扩大的时机,用好进口大国、对外投资大国的独特地位,打造大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放大进博会积极效应,加快提升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和引进来、走出去的桥头堡功能及核心平台作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上海大都市圈扩展 迈向“第三个阶段”

■ 任远

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长三角步入更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基于城市群发展演化的角度,如何看待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呢?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产业和市场力量的扩展。不断加强的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推动跨行政区划的协商与合作。仅就政府协作而言,它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破除阻碍市场发展的行政壁垒,如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打通跨地区“断头路”以及对企业融资、信用等方面的限制,等等。

第二,解决城市发展的外部负效应,如解决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对周边和下游地区的不利影响。

第三,通过协商使区域竞争能够维持相对一致性标准和共同目标。现实中,恶性竞争只会形成向下竞争的后果,既不利于资源配置,也会损害区域的整体、长远利益。

第四,推动构建跨地区事务的衔接。例如,随着大量人口的迁移流动,有必要加强医疗保险的跨地区衔接、人口管理常住地信息的跨地区共享,等等。

按照霍尔对于城市群演化过程的分析,在区域性城市体系中,往往是首位城市率先发展,城市首位度不断上升,并造成区域内的资源集聚;然后,通过首位城市的扩散效应带来都市圈的形成;随着首位城市的扩散会形成多中心城市,带来二级城市的快速发展;区域二级城市的都市圈发展形成不同的城市组团,从而构造出密集的城市网络。

由此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处于上海大都市圈扩展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迈向多中心城市组团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其中,上海作为首位城市得到快速发展,但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相对滞后。未来,需要通过大都市圈的发展来增强上海产业发展能力,加强上海产业扩散能力。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城市和腹地正在发生日益密切的交往,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等构成一个复合保护都市圈结构。但冷静来看,不仅上海大都市圈发展缺乏成熟的经验,而且相关二级城市的都市圈发展也面临瓶颈挑战,从而导致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构造仍缺乏深度。

不过,都市圈具有跨行政区划的特点。可以预见,随着都市圈力量的扩展,都市圈作用的相互交错,长三角城市群将得到更大的支持,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繁荣。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积极转换国家角色 推动海洋秩序重构

■ 金永明

2019年6月8日是第11个世界海洋日、第12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本次海洋日的主题为“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近年来,世界各国开发利用海洋空间和资源的力度日益加大。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活动的无序性、过度性,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多样性带来直接危害,还对海洋的承载力和自净力带来挑战。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通过,但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方面依然存在制度性缺失。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需要通过政府间磋商制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以实现制度化规范保护目标。

这一国际文书谈判应以协商一致为原则,避免采取投票方式决定有关事项;应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不能偏离其原则和精神,也不能破坏其建立的制度框架,更不能与现行国际法及现有的全球、区域和部门的海洋机制相抵触。

它应以维护共同利益为目标,既要维护各国的共同利益,特别是顾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要维护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应以合理平衡为导向,在各方和各种利益之间建立合理平衡,不能厚此薄彼。

对中国而言,我们应该根据自身地位的多重性,在海洋秩序重塑和构筑过程中积极转换角色。

一是从遵守到制定的转换。长期以来,因为多种原因,中国很少提出有关海洋治理的见解规则。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创造条件、把握机会,努力向规则制定者角色转换。

二是从维护到引导的转换。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以及认识海洋程度的加深,我们应就海洋规则的发展和完善提出更好的建议和要求,注重培育议题设置和制度创设的能力。

三是从模糊到精确的转换。在应对海洋问题时,一些模糊的表述或用语,如近岸水域、邻近海域、相关海域和历史性权利等,不利于维护利益、主张权益。我们有必要依据海洋法规则对相关用语和概念予以清晰定义。

四是从实施到监督的转换。应适度创造条件和机会对其他国家实施的海洋规则和制度予以监督和评估,实现由实施者向监督者的转换。

五是从事务到普通的转换。依据国情和社会发展特点,我们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国内海洋法律体系。如何让国际社会认可中国的相关立场和观点,理解我们的海洋政策,需要更多的解释和交流。

六是从承受到供给的转换。由于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中国提供的海洋公共产品还不是很多。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化,我们已具备了提供更多、更优质海洋公共产品的意愿及能力。下一步,在海军护航行动、丝路基金等平台之外,还有必要创设新的合作项目。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

基层党建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城市从大规模更新改造向加强社会治理转变。在此过程中,基层社会承接、消化了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类矛盾,城市基层党组织逐步实现了功能转换。

一个经验是,必须坚持资源配置下沉,包括管理下沉、工作重心下沉、骨干力量下沉。与之相伴,机构体制也需不断优化完善,人才政策要朝着基层集聚,从而增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第四,激发主体创造活力是城市基层党建的活力源泉。

70年来,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创造了一张党建名片。这一个节点适应了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用精准有效服务凝聚了党员群众,增强了党的影响力、号召力。在实施国家战略、加快科创中心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中,上海要进一步激发主体创造活力、不断提升组织力,出新招求实效,更好地服务、凝聚、引领党员群众,做到“党要跟人走、人要跟党走”。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研究员)